

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

作者：陈君静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2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逐渐改变了过去“整体研究”的学术形式，掀起了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尽管这一学术转向尚存在许多缺陷，但它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不仅为中国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并在方法论上带来了创新。

The scholar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hanged the view of the whole history to study local history of China since 70s and made great successes, though the studies show some defects. The studies not only create a new fields of historical study and add new contents of research history, but also bring about new methods to study history.

【关键词】近三十年来/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Local history of China/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中国史学界“把中国广大国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历来成为风气。”^①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将研究的焦点从过去的“整体研究”转到地方史的研究上。这些学者在中国地方史的研究中，逐渐淡化过去中国史研究中强烈的对策性色彩，与费正清一代刻意观照中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不同，形成了与传统的“整体研究”有着很大差异的学术趋向。本文试图对这一学术趋向作一简要的回顾和总结。

注释：①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次扮演了世界性的角色，中国史研究与其它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一样，作为其霸权冷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官方史”特征。在这一领域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学术人物。由于当时美国从事中国史研究的许多学者，或是他的学生，或是受过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使得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依照他的“冲击—反应”的模式来进行的。国家范围的政治史、外交史、制度史，以及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研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主要形式。在这些著述中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芮玛丽(Mary C. Wright)的《中国守旧派的最后一次反抗》(The Last Stand of China's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列文森的(Joseph R. Levenson)《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Liang Ch' ich' a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督商办》(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and Mandarin Enterprise)、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在当时都非常有影响。

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学者开始对中国史研究的这种倾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过去的研究过度地关注了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它把中国的变化归之于西方的“冲击”，忽视了中国内部的差异。这种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是使中国史研究逐渐走出从前简单地将中国视为单一实体进行“整体研究”的误区，引发了将中国史研究在空间上加以分解的“地方史”研究浪潮。

在这一浪潮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书虽说以全国为范围，但研究的空间却是有限的。它集中考察了华南与华中地区的社会基层组织，并且运用大批地方志的材料与回忆录来分析团练组织和地方社会的关系。^①

此书出版后的五、六年间，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研究的焦点逐渐从国家范围向下转。最先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省一级的层次上。如：楼兹(Edward J. M. Rhoads)的《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到1913年间的广东省》(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凯普(Robert A. Kapp)的《四川与共和中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1911—1938》(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舍登(Donald Sutton)的《地方军阀与共和中国：云南军1905—1925年》(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1925)和周锡瑞(J. W. Esherick)的《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差不多在这同时，以省级以下单位为考察范围的研究也出现了。较为重要的有：贝蒂(Hilary J. Beattie)的《中国的土地与氏族：明清时代安徽省桐城县的一个研究》(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A Study of Tung-ch' eng County, Anhwei, in the Ming and Ch' ing Dynas

ies)、包德威(David Buck)的《中国城市变迁: 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和发展》(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 以及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关于同治时期苏州和罗威廉(Wil liam T. Rowe)关于汉口社会与经济变化的研究等。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 在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转向过程中,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是一位最为重要的学术人物。施坚雅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地方史研究主要囿于行政区域空间的局限, 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的理论。他于1977年主编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由综合性研究转向地方性研究过程中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该著可说是地方史研究潮流的一种反映, 所涉内容大部分是某一城市的个案研究。如: F. W. 牟复礼(Fritz Mote)关于14世纪后半期南京城的历史和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对宁波及其腹地的探讨。然而, 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则为施坚雅的五篇论文。这些论文与他的其它一些论著作为一个整体, 可以称之为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真正突破。

在这些论著中, 施坚雅运用中心地学说的原理进行了关于中国城市史以及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他通过对19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进程的详细考察, 认为“由于中国各大区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结构, 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没有哪两个区域的城市体系是想象的。”^②因此他在力图确定十九世纪中国城市化程度的同时, 引进了区域研究方法, 并在大规模经济区域的意义上, 将19世纪中国划分为9个区域, 提倡进行打破省份界限的不同区域的研究。在施坚雅看来, 中国历史的结构“是一个由网络相连接的地方史和区域所组成的层次概念。它们的作用范围体现在人类相互关系的空间形式之中”, 历史学家在分析某些微观进程时应当把微观考察和宏观透视结合起来, 将局部地方史与大型区域史联系起来, 而且“只有在一个富有意义的整体中加以详细阐述, 才能揭示出地方史学者研究成果的真正意义。”^③

注释: ①详参拙作《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②施坚雅著: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第168页。

③同上, 第22页。

总之, 施坚雅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 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发展和地方市场结构所做的大量、细致、别开生面的研究, 使中国的中国史学者提高了在研究经济社会史时的空间感, 注意到了地理条件和空间关系。

受施坚雅跨行政区域研究方法的影响, 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出现了跨行政区域多点研究的新形式。如: 黄宗智(P. Chung-chieh Huang)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族与乡村发展》(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跨越清代史和近代史鸿沟, 对长江三角洲600年间的历史进行纵向考察; 杜赞奇(Prasenjit Durr)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和黄宗智从不同的角度对华北农村的社会和文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而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中则围绕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几个重要区域进行了集中考察。他认为, 义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意义, 但是它归根结底是一次地区性的运动, 而且“一个省份本身地区差异都很大, 很难作出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概括”, 因此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在描述山东省内各个地区的特征上面。”^①同样, 萧邦齐(R. Keith Schoppa)对沈定一的研究主要也是围绕几个明显具有政治意义的场所展开讨论。他认为, 历史研究“应当对空间予以更多的关注”, 作为大都市的上海、省会的杭州和乡村的萧山衙前, 沈定一在这三个活动场所其“整个身份序列的结构和含义是随着区域背景的差别变化的。”^②

(二)

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加强地方史研究的趋向, 不仅是对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初期反战运动中的反帝与自我批判倾向作出的回应, 而且也是对60年代以来美国整个史学界内部的变化作出的回应。在这里, 年鉴学派的影响尤为至深。

从60年代中后期起, 年鉴学派通过学者交换等方式大举渗透到美国各大学历史系。年鉴学派强调人类社会是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 主张在总体史观的指导下深入研究某些特定地区的总体史, 认为地区史“作为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和样板, 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群体的历史, 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总体的历史面貌。”^③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70年代美国史学界兴起了“重新发现美国历史的复杂性”, “重新察觉历史动力的多样性”浪潮。^④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史化”倾向即是这一史学潮流的一种反映。

注释:

①周锡瑞著: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364页。

②肖邦齐著: 《血路: 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249页。

③吉尔伯特莱编: 《当代史学研究》, 台湾明文书局1982年, 第285页。

④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0.

首先，社会史和文化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7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史家为了深入而具体地重新考察中国历史，缩小了研究单位，开始从事地方史的“个案”研究。在地方史研究中，他们的重点又放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上，从而拓宽了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研究三分天下的治史格局，使社会史和文化史成为研究的双翼。

在这类研究中，魏斐德(Frederic Jr. Wakeman)、戈德曼(Bruna Goldman)、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杜赞奇等人的著述都很有代表性。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是一部以中英关系为主要对象，以广东为主要地区，以1839—1861年为讨论时间界限，以中国南方社会变迁为主体而写成的著作。戈德曼在其新著《家乡、城市和民族：上海的地区网络和身份》(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中探索了会馆-大众社区生活的紧密关系，并提出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建立的许多供奉移民崇拜的神祇和先贤的会馆，成为了社区的象征性中心，对市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它如杜赞奇、裴宜理、黄宗智、周锡瑞等学者都从自己考察的空间范围着手，对地方的社会和文化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而艾尔曼则将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他在《从理学到朴学》(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中试图透过政治和地方史的视角展示考据学的崛起，其考察的空间对象是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常州。艾尔曼的另一部新作，则将18世纪今文经学的重新崛起与常州地区的社会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了考察。他在该著作中指出，明清时期的学者因为个人和地域团体的差别，文学或哲学宗旨不同，或师承关系的区别而被界定为家学。常州今文经学即是这种家族学术理念的体现，它的传统“仰赖于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宗族纽带”，因此，研究常州的今文学派必须“探讨清代今文经学形成过程中经学、宗族、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三者互动的过程。”^①

其次，普通民众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受新史学和年鉴学派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关注地方层次的同时，研究对象也日趋“下层化”、“大众化”，大量的“不入流”的无知沉默的民众成为史著的主角。

穆黛安(Dian H. Murray)在《华南海盗》(Pirates of South China Coast, 1790—1910)叙述的是关于广东沿海和内河水道海盗的完整故事。斯特兰德(David Strand)从对北京黄包车夫的生动描写出发，写出了一部既是北京都市史也是民众运动史的著作。韩起澜(Emily Honig)的一本关于在上海苏州人的书中(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从剖析社会群体问题入手，试图揭示生活在上海的苏北人被歧视的原因。她的另一部著作《姐妹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女工》(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反映的是大都市纺织女工的生活，并通过30年代盛行包工制度的研究，探讨了青帮在上海市政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著作与赫沙特(Garl Hershat)所著的反映天津码头工人的著作——《天津的工人》(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都代表了80年代美国中国史学界研究城市工人阶级新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研究革命史时也一反过去以个别英雄人物或党派为主题的治史传统，主张从地方的民众运动中去理解革命。周锡瑞在叙述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湖北的情况时，就把革命看作为乡村和城市的民众运动，整个运动是一个分化了的士绅阶级和新兴的社会势力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的过程。同样，裴宜理探讨的是淮北地区在近世纪的三次民众运动(捻军、红枪军、共产党革命运动)。她在书中提出，在诸如淮北这种自然环境异常严酷的地区，资源常年不足，农民的集体暴力行动就构成谋求生存的合理策略。而共产党力图把农民的反抗精神“从掠夺与保卫的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改造成为对新社会秩序的明确追求。”^②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其它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

地方史研究在选题时往往倾向以空间而不以专业来限制研究对象的范围。理想的成果一般是对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作出综合性研究。这就需要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合理运用。为此，一些学者跨越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理论鸿沟，将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当中。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化”倾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通过细致入微的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因素的复原，加深对下层历史的了解。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社会结构的研究，其突出的成就是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复杂情况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起来，并对农村的集市规模进行了分级。孔飞力则“采用了施坚雅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了剖析。^③其它如周锡瑞、杜赞奇和裴宜理的著述均广泛地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特别是当历史学越来越多地转向民间文化的研究时，更倚重于人类学同仁的研究成果。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近年来西方人类学关于通俗文化的研究成果。”^④该著作放弃传统的，由组织源流入手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义和团的仪式以及蕴育它的华北

村的文化习俗、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生态以及政治背景。杜赞奇关于华北农村的著作中，用近乎考古学的方式来研究庙会、宗族、神话的文化象征，并从人类学的意义上使用了“地界性”(territoriality)一词，认为一个群体的活动范围不是由该群体的功能需要(如市场活动)所决定，而是“由一个早已存在的区域界线——如一座庙宇的‘神力圈’，而圈外文人可能并不信奉该庙的神灵——所界定。”^⑤

注释：

- ① 艾尔曼著：《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序论》第7页。
- ② Elizabeth Pre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46.
- ③ 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 ④ 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前言》第9页。
- ⑤ 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序言》第3页。

最后，在史料方面，方志、档案、宗谱和口述文献成为主要的材料。

决定地方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用来进行这种研究材料的性质。地方志作为主要记载一个行政区划的政治、经济、文化、物产和社会习俗方面的综合性的资料，由此就成为研究地方历史和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

施坚雅在研究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时，深刻地体会到方志的重要性，认为“数千部方志为县或其他行政单位编写的地方性的志书，提供了地方市场和通常有关交易过程本身的异常详尽的资料。”^③因此，在他的著述中大量地引用了方志材料。

注释：

- ③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3—43.

其它关于地方史的著述也无不以方志作为重要的史料。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引用了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的十余个县志和村志。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所应用的各种方志有近五十种。穆黛安把省府州县的地方志视为观察海盗最为丰富的资料。她那本关于华南海盗的著作将诸如广州、香山、顺德、南海等各种府县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加以利用，其中还包括《南海县志》所附的朱程万传记中的一篇完整的论述海盗的文章——《己巳平寇》。穆黛安还大量利用台湾、越南方面的档案以及一些私家记述，如袁永纶的《靖海氛记》、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的日记和议事录，来补充“官方”资料的不足。

除此之外，口述材料也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周锡瑞将义和团起源的研究建立在历史文献与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在他所应用的资料中，最主要的是60年代山东大学所做的调查资料。周锡瑞认为，所有这些新资料，包括新公开的档案和口述历史，使他能够更详尽地观察义和团兴起地区的地方社会和民间文化。另外，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的发展，1890—1949》(*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及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有关村级结构的资料大量的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材料——主要是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这一报告主要部分是关于河北和山东六县六村的情况，其中大部分是当时采访农民的记录。

(三)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总是以“王朝周期循环”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他们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始终处在王朝循环的“停滞”状态中，整个社会充满“惰性”，唯有等待西方猛力一击，才能沿着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但是，现在许多学者通过地方和区域史的研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以一种更为动态的观点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

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过去把中国史的“各种现象加起来，再加以平均”的做法，只能使人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因此要想对中国历史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①马若孟要求学术界不要将他研究华北的结论随意应用于其他地域，因为中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往往西北地区出现大饥荒时，华中地区的农业情况仍相对繁荣，所以只有当其它学者研究了其他地区后，才“可以就中国农民经济提出一个总的理论。”^②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研究在萧邦齐的《中国的精英和政治变化：20世纪初的浙江省》(*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中也得到了进一步表明。萧邦齐认为，即使在一个省份之中(如绍兴、宁波、杭州)精英类型也是多样的，他们的专门化、商业化以及政治上的组织化程度都有相当的差异，其最明显的变化在于精英的居住地愈是靠近封闭的、多山的边陲地区，愈是具有军事化性质。

总之，地方史研究的深入为美国中国史学界提供了一幅更加多样化的中国历史画面。而随着多样性的增加，人们对过去的某些定论提出质疑也越来越多。例如，长期以来美国学者认为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分歧是一条“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③但是兰金(Mary Rankin)、楼兹、周锡瑞等人通过对浙江、上海、广东和湖南、湖北的研究，指出“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往往互相交错，致使两者之间有时似乎已无法区别。”^④

同样，贝蒂关于明清两代安徽桐城县地方上层社会的研究，也对以往有关这一时期中国上层社会的若干标准的结论提出了挑战。过去，美国学者一般认为，通过科举考试是取得绅士身份必不可少的一步，而在明清两代上层社会内部，上下流动的现象已相当频繁。但贝蒂通过研究认为这种现象在桐城皆不属实。她指出，该县上层社会人物绝大多数出自六大宗族，这几个宗族在明朝后期已扎下根基，并在整个清朝继续统治着当地社会。因此，确定明清时期上层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始终是土地占有情况和宗族组织关系。

地方史研究的深入也使美国一些学者突破了“王朝周期循环”历史观的局限，开始致力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动力的探讨。

施坚雅在探讨中国历史的结构问题时指出：中国历史结构发展变化具有一种周期性，但这种周期不是王朝更替的周期，而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衰落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内的各种资源，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文化的，都在日益增长，被适度地调配，并卓有成效地加以利用。”^⑤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这些学者通过地方史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若干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跨最近四个世纪一直伸延入民国时期”，类似“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力役折银，某种区域性贸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绅士队伍的扩大，地方管理工作的商业化”，皆“推动了若干行政与政治方面的变化”。^⑥一些学者还在充分发掘地方历史的“本土性与内在性的变化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由于经历了明清两朝巨大的历史变化，19世纪初的中国“已处于全面引发中国社会变革力量兴起的西方及日本侵略的前夜。”^⑦

注释：

①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第142—143页。

②Ramon H.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 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94—295.

③K. S. Liew, *Struggle for Democracy: 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159.

④Edward J. M.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73.

⑤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⑥Frederic Wakeman, Jr., Introduction: *The Evolution of Local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 2.

【关键词】，1975, P. 2.

⑦艾尔曼著：《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

史学研究应当努力去填补过去的空白，扩大史学研究的领域。地方史研究的地域范围可大可小，大以至于长江流域的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小以至于某时、某地、某人 和某物的考察探微。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化”倾向，把历史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 结合起来，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地方民众，它改变了过去中国史领域只注重精英史、制度史、外交史、政治史的状况；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则从空间意义上扭转了设问中国历史的方式，特别是史料范围的扩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它使历史研究显得饱满丰腴，富于情趣，同时也为整体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中国史学界通过不断深入的地方史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不仅为史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在方法论上带来创新。

但是，在史学研究中，宏观与微观，个别与整体具有相对性，是相辅相成的。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没有具体的个案分析，不会有一般的学术成果，反之亦然。地方史研究的缺点就在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适当地代表整个中国复杂情况，缺乏全国性的视野。美国从事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学者总是喜欢把研究的空间分解得越来越细，而忽视对全国性历史演进规律的探讨。对此，一些学者已经看到了其中的弊端，呼吁大家必须“将区域研究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通过考察特殊来折射一般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因为“一种宏观性的历史视角”将能够“展示一幅更为广泛的地域性图画。”^①

注释： ①同上，第246页。

- 上一篇文章: 没有了
- 下一篇文章: 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胡适与俞平伯
- “纪念亚洲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 瞿同祖 (近代史研究所)
- 杨天石 (近代史研究所)
- 蒋大椿 (近代史研究所)
- 张海鹏 (近代史研究所)
- 朱东安 (近代史研究所)
- 虞和平 (近代史研究所)
- 闻黎明 (近代史研究所)
- 姜涛 (近代史研究所)

 网友评论: (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 100006 传真: 65133283